

巴金《家》中的历史

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

Fact in Fiction
1920s
China and Ba Jin's *Family*

An affluent lawyer in Chengdu, capital city of the populous, literate province of Sichuan, was among those stirred by his spirit of reform in the 1920s. Later, under the pen name Ba Jin, he wrote three novels—*Family*, *Spring*, and *Autumn*—that so vividly dramatized both the evils of the old culture and the 1920s thirst for reform that their storylines became a key element of popular understandings of China's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se novels, known as the Turbulent Stream Trilogy, continue to influence how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era is remembered. The novels in the trilogy are all set in Ba Jin's hometown, Chengdu. Many aspects of life in that large, inland city are described to some extent throughout the novels. But Ba Jin did not set out to offer his readers a realistic portrait of a particular city. He wanted the Gao family to be seen as representative of a type of patriarchal family common across China. By limiting his focus to interactions among members of the family, he highlighted the familial power structure sustained by Confucian thought that could be so damaging to the lives of all members of the family, but particularly to the young and weak.

[美] 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 著
何芳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巴金《家》中的历史

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

[美]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 著 何芳译

Fact in Fiction
1920s
China and Ba Jin's *Family*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 / (美)
司昆仑 (Kristin Stapleton) 著；何芳译. — 成都：四川文
艺出版社，2019.6

ISBN 978-7-5411-5027-2

I. ①巴… II. ①司…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小
说研究—中国—现代 ②社会变革—研究—成都—近代
IV. ①I207.425 ②K29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88606号

FACT IN FICTION: 1920S CHINA AND BA JIN'S FAMILY
by Kristin Stapleton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2016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
sup.org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21-2017-222

BAJIN JIA ZHONG DE LISHI 1920 NIANDAI DE CHENGDU SHEHUI

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

[美] 司昆仑 (Kristin Stapleton) 著 何芳译

责任编辑 余 岚
封面设计 叶 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唐 茵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开 本 32 开
印 张 9.7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027-2
定 价 58.00 元

__导语：

巴金小说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

1919年5月4日，当北京的学生示威变成意外的暴力冲突时，这个事件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场政治危机。整个国家的人们都对年轻的中华民国政府（还不到10岁）改变中国社会提升中国国际社会地位努力的失败而沮丧。在1919年以前，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倡议用“新文化”来取代传统价值观念。五四运动及其围绕该事件产生的舆论将社会基础改革提上国家日程。接下来的几年里，改革者们针对他们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见的罪恶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其中有些还付诸试验。一些人认为中国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家长制大家庭以及伴生的观念体系是问题的根源。

在1920年代被改革精神拨动心弦的人之中，有一位生活在成都的富家少年，成都是人口众多的内陆省份四川的省会。后来，他用笔名巴金写下了《家》《春》《秋》三部小说，十分生动地揭示了传统文化中的罪恶，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的社会对变革的

渴求。小说描写的故事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部小说被称为“激流三部曲”，一直影响着人们对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记述。^[1]

1977年，巴金写道，“激流三部曲”中最著名的一部小说《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被读者遗忘也许更好一些。而在这十年以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巴金的小说就被定性为“毒草”，不适合真正的革命者阅读。^[2]

但《家》及其续篇一直拥有广泛的读者。1956年摄制的电影《家》在全国各地的音像制品商店里都可找到，也能在互联网上观看。1988年和2007年，各有一部根据“激流三部曲”改编的电视剧问世。在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里，《家》的英文译本也常常是课程的一部分。“激流三部曲”最早出版于1931-1940年间，（因而）对于那些囿于一个几乎无法掌控的社会之中的青年来说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小说的情节围绕着巴金的痛苦展开一种在家长制家族里常见的痛苦。在“激流三部曲”的故事发展里，富有而等级森严的高氏家族，随着年轻一代对长辈的压迫、腐败和伪善的反叛而分崩离析。

由于小说大受欢迎，无论是在国外还是中国学界，“激流三部曲”对于理解20世纪早期的中国历史都十分重要。小说的时代背景是1920年代初期，五四运动刚刚结束，学生们开始公开地抗议中国之积弱，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种积弱归咎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在中国家庭生活里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些伦理道德——这种信仰和礼仪体系在英文里常被称之为“Confucianism”^[3]——广受抨

击。巴金的一位老师吴虞，在1919年前后就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位领军人物。吴虞认为，正是要求年轻人以老为尊的传统孝道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软弱的顺民。他论述道，在这样的传统中长大的孩子，成人以后极易被宣扬国即为家和纲常等级制度的统治者摆布。^[4]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即是用极其感性的描述传达了这一思想，特别是高家年轻一代中的长子觉新，他就是被祖父老太爷的期许活生生压垮了。因此，三部曲成为新文化运动抨击旧文化和儒家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春》《秋》系列成为五四（后）新一代政治社会活动者的重要宣言。

“激流三部曲”都发生于巴金的故乡——成都。小说里对于这个内陆大城市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做了不少描写。但是巴金并不打算给他的读者描绘某一个特定的城市。他希望高家成为中国随处可见的那种父权制家族的一个缩影。通过将重点放在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巴金突出了靠儒家思想维持的家庭权力结构对家庭所有成员特别是年轻人和弱者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巴金对社会变革怀有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得他在小说中的情绪表达尤为激烈。但是，对于五四时期的历史来说，“激流三部曲”掩盖的和它揭示的一样多。要想真正理解《家》《春》《秋》系列中描写的社会动荡，我们必须从小说之外的历史记录中寻求资料。这正是本书成文的目的——探寻巴金小说背后的历史。我们认真地研究了巴金小说产生的社会背景：五四时期的成都。对于还没读过巴金小说的人来说，1920年代的成都本身就

很值得研究，特别是把它跟同时期的其他东部中国的城市北京和上海相比。就世界范围来说，1920年代也是技术、社会、文化都急剧变化的十年，然而这些变化在世界各地并不是同时、均衡发生。成都的情况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一个中国内陆省会城市对于这些变化的复杂反应，比如说对于民主和妇女解放的呼吁，西式学校和医院等新机构的出现，军事化加强，以及经济动荡，这些在巴金的小说中并没有多少体现。因此，这本书旨在重新建立巴金小说中的戏剧性故事和激发了小说创作的真实城市生活间的联系。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这本书展示了一个对成都更为全面的描述，不仅仅只关注像小说中的高家这样的地主家庭，还关注构成城市社会的其他阶层。对那些熟悉小说和相关影视作品的人以及相关研究者来说，这些细节描述可以令人对巴金在历史当中的成就和局限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1940年，巴金完成了《秋》，他打算写作这个系列的第四部小说——《群》。这个名字可被翻译为“the group”（中文意为“团体”），或者“the collective”（中文意为“集体”），或者“the masses”（中文意为“群众”）。对于巴金的前三部小说，有人批评说高家的成员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过于脱节——他们生活的城市，造就他们生活方式的地主制度，以及这个年轻的、不断受到国际事件冲击而四分五裂的中华民国。《群》的写作计划也许可以看作是巴金对于这种批评的回应。

然而巴金没能开始《群》的写作。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巴金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精神中去，写了

一批描写工人和农民阶级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英雄的散文。1952年和1953年，巴金随军驻扎在朝鲜数月，记录中国称之为抗美援朝的战争。在50年代，他也对早期的小说，特别是《家》，做了修订。简化了语法，稍微调整了书中的政治立场以便该书更符合共产主义史观。

正是由于《群》的写作未能完成，《家》和“激流三部曲”的读者对于故事发生的场景有着相当不完全的认识。这是很不幸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五四领袖们对传统的攻击性使得他们歪曲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本来面目——他们往往过分强调中国的“落后”以证明改变中国的计划的正当性。^[5]这种对中国的过往极端拒斥的现象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激流三部曲”因为不够“革命”而成为禁书。巴金本人也被迫批判了“激流三部曲”和自己其他的一些作品。

到了1970年代末期，中国人又被允许阅读“激流三部曲”了，《家》在年轻读者中再度大受欢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了，没有人经历过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描写的那种生活。工业化进程以及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发起的种种运动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面貌。大家庭不再共居在深宅大院里以麻将和看戏消遣，也不再有大家族的仆佣去各地收租以供给他们奢华的生活。家长不再给连面都没见过的青年男女安排婚姻。年轻女子也不再害怕剪去长发。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被巴金扣人心弦的小说吸引有一点值得警醒：无论是否生活在中国，他们都太容易将巴金描述的

“旧中国”当作是真实的历史。他们可能以为大部分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都过着小说中高家子弟那样的生活：与外界隔绝，压抑，令人窒息，甚至致命。在“激流三部曲”中，巴金刻意夸大了他童年生活中的阴暗面，以使对封建家长制家庭的控诉更有力。另外，通过描写书中的青年男女主角如高觉慧和高淑英，逃离他们（也是巴金自己的）没有希望的故乡奔向大上海自由的生活，巴金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像上海这样受国外的强烈影响、创新层出不穷的沿海城市，和文化发展停滞的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本书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巴金在塑造一个被1930年代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们广泛抨击的“传统中国”形象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6]今天，“激流三部曲”的读者应该记住，这些小说是服务于这个特定的政治目的的。另一方面，巴金是一位天才的感性的作者，他从自己在成都的生活中提炼勾勒出来的这些角色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读者。家庭中的代际冲突是各种文化中常见的主题。巴金的作品很容易使我们代入20世纪早期中国的生活中去，那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传统智慧受到剧烈冲击，社会秩序土崩瓦解，新的政治力量争相设法在转变中的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景。

正如我们刚刚指出的，小说中体现出很多巴金在成都的童年生活的细节。如果对《家》《春》《秋》系列的阅读理解不仅仅停留在一出家庭悲剧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城市社会的轮廓在高老太爷严厉的家庭统治间若隐若现。本书的目的就是看清楚巴金成长起来的这个城市。这样能帮助我们了解巴金是如何有选择地

采用自己的童年经历来炮制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有力控诉的。同时，了解成都也能帮助我们从一个与巴金小说和五四作家作品以及他们所宣扬的历史记述中都不同的角度，来理解1920年代中国城市生活面临的挑战。

既然“激流三部曲”一直在帮助不同时代的读者理解1949年以前的中国，我们也应该定期对其进行重新评价。不断获得新的史料或者新的观点，使我们能够以新的角度来理解高氏家族，也使得这部作品对于新一代读者来说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小辈年轻人如此依赖专断跋扈的祖父老太爷？士兵在城市里面如何战斗？在那个时代，该地区经济创造了什么样的工作机会？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子剪发就会使她的母亲蒙羞？本书即是通过研究巴金青年时代性格形成时期（也就是小说发生的背景）的历史史料，来揭示这些关于当时的成都社会和政治情况的问题。

前面提到，这项研究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强调“激流三部曲”作为中国五四时期历史的局限性。伟大的小说在影响后世读者对历史事件方面的力量不容小觑。有多少美国以外的人是通过《飘》的小说或者电影初识美国南北战争的？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又怎能避免获得这样一个印象：这场战争最大的后果就是南方上流阶层流离失所？关于小说的历史背景是否失实的争论在美国很常见：比如说，畅销作品《相助》就小说和改编而成的电影中对1960年代密西西比黑人女仆生活的描述到底是好还是坏这一议题，引起历史学家和其他人等的大量讨论。^[7]

“激流三部曲”无疑也塑造了很多人对中国文化和20世纪中

国历史的看法，特别是对中国家庭模式和新文化运动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部曲本身就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本书将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巴金本人对于他成长的社会和世界的诠释，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不欣赏他的作品。除了对中国传统家庭持特别负面的看法外，巴金的作品更偏重于情绪的冲击而忽视了社会历史。与巴金小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劫人的作品，李劫人也出版了一部以20世纪早期的成都为背景的小说三部曲。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他的小说的名气都比“激流三部曲”小得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作品缺少巴金小说中的情感冲击。但李劫人实际上是一个优秀得多的社会历史学者。通过揭示人物怎样囿于社会关系以及他们的选择如何受限于习俗和律法，李劫人对于早期成都生活的描摹更加真实，对于小说中不同角色的行为逻辑也（解释得）更为合理。^[8]

跟李劫人不同的是，巴金把读者需要了解的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留待他人来填补。这正是我们这本书要做的。我们有时也会对李劫人和巴金对于那个时代的看法做个比较。不过，本书主要还是基于浩如烟海的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史料，特别是与成都有关的资料。作为中国西部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成都哺育了包括巴金在内的20世纪许多著名人物，本书也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做了研究。蕴藏在地方档案和其他记录中的丰富的城市历史使我们能够为这个城市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画像，它远离那个时代国家的政治中心，但又分明能感受到并推动中国历史洪流的激荡。

本章导语接下来的内容会介绍巴金的生平，以便我们了解

“激流三部曲”出版和大受欢迎的历史环境。本章最后会以对贯穿本书的主要问题的讨论作结：封建家长制和儒家家庭，军阀政治与中国城市，在20世纪早期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变革中革命的性质，以及这些变革对中国家庭和中国城市的影响。

巴金与“激流三部曲”

巴金的人生和他最著名的作品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相互交织无法分开：故事的创作过程和“激流三部曲”被广为接受，让我们看到历史事件是如何影响到小说中的一些标志性人物以及故事本身如何变成一个文化变迁叙事的核心。巴金常常坚持读者不应在他的生活里寻找《家》的主人公高觉慧的影子，然而两者的生活轨迹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9]

童年时期的巴金原名李尧棠，成人之后他为自己取了笔名巴金。像小说中的高觉慧一样，他生于四川省会成都的一个富贵人家。巴金的父亲也像觉慧的父亲一样是家中他那一代的长子，是清朝（1644-1911）末期的一位政府官员。他的母亲也如觉慧的母亲一样很年轻就去世了。现实中的父亲与书中一样，再娶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孩子们与严厉冷漠的祖父、叔叔婶娘、表兄弟姊妹和仆人们一起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巴金的兄长，如同小说中的高觉新一样，屈从于祖父老太爷的意志，肩负着传宗接代和维持大家庭的重任。巴金和高觉慧一样，年轻时就离开成都去到中国东部。在小说《家》的最后一幕里，觉慧在1920年代早期就在

一艘开往上海的船上与家庭决裂，而巴金与家庭的决裂却花了很长时间，直到1931-1932年间小说在上海的报纸上连载才算是公开宣告。

由于自己的家庭与小说中的高家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小说很快就被看作是自传性质的写作，而巴金为什么决定写作这样一部小说来谴责中国上流阶层的价值观和行事方式？在多年间发表的有关他的小说和写作生涯的散文里，他本人数次回答了这个问题。比如他的散文集子里有一封1937年写给一位表哥的信。他在信里说道：“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其他青年不再被困在家庭‘礼教的监牢’（这是他在短篇小说*Under the Street Gate*里用过的短语）里……并不是报复私人而是攻击这个制度。”^[10]他厌恶老一辈伪善地利用儒家伦理道德控制人们，打压任何对其恶行的反抗。当《家》发表广受欢迎之后，他写了两部续篇。第一部是《春》，故事与《家》相近，只是这一次是一位年轻的女性为主角挣脱了家庭礼教和专制的监牢。“激流三部曲”呼吁青年人不要接受长辈们安排的人生，而是应该努力奋斗实现自我梦想和社会公平。

巴金这些小说还一再表达了他对于青春的热爱，他认为青春会在死板僵化的家庭生活里窒息而在志趣相近的朋友那里点燃。在1933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朋友》的散文里，巴金感谢了那些帮助他在绝望中坚持下去的朋友们。他写道，朋友是比家庭更珍贵的。但是兄弟也能成为最好的朋友。巴金与两位兄长的关系也能说明这个观点。他与李尧林（图1.1）和李尧枚（参见图

7.3) 之间亲近的关系成为高家三兄弟——觉慧、觉民和觉新的原型。^[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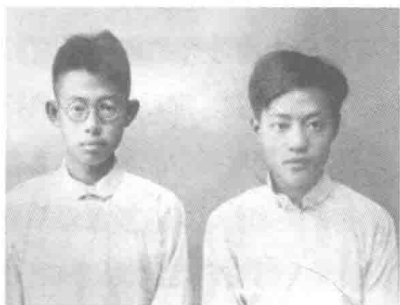


图 1.1 1925 年，巴金（右）与二哥李尧林。照片由巴金研究会提供

姐妹们的地位以及女性的人际交往对于巴金来说更难处理一些。下一章里我们会谈到，巴金大部分时候对性的话题是避而不谈的，或者只是把性看作是放荡堕落。在他的小说里，两性关系从未像他描写的男青年之间那种同志般完美而亲密的感情。同辈男女间的浪漫情愫有时很复杂甚至常常使人生恼，伴随着迷恋，或者妒忌，或者遗憾，甚至恐惧。巴金本人 39 岁结婚时，他的妻子陈蕴珍（后称萧珊）未满 27 岁。她还是学生的时候作为粉丝给巴金写了一封信，婚前数年他们两人已经成为很亲近的朋友。与萧珊的交往可能对巴金创作高觉新和女仆翠环的爱情故事很有帮助，也因此给了小说《秋》一个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美好结局。

反抗家庭和社会里常见的压迫和伪善的需要，对于青春的美好热情，对一个更加公平的未来世界的期许，对志同道合和爱情

的追求，这些是巴金作品里的主题。正如他在“激流三部曲”总序里写的那样，他要帮助读者欣赏从中国社会的乱山碎石中间激荡而出的生活的激流，这激流也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

启蒙巴金成为职业作家并被借鉴模仿的人很多。^[12]当他还是孩童时，父亲常常带他去看戏曲表演并和他谈论里面的故事。从很小开始，他就酷爱读书。背诵诗歌、学习儒家经典，也喜爱中国古典小说。15岁时，他读了俄罗斯哲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告少年》一文，这篇文章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被无政府主义组织广泛传播。巴金自己曾说，他当时被克鲁泡特金号召富家子弟应牺牲个人安逸去帮助穷人并创造一个更公平的世界的观点深深地打动了。1910年代，巴金开始通过北京和上海创办的一些期刊接触到革命文学和一些社会活动家的作品，这些期刊中就有著名的《新青年》。^[13]他还给《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写去一封激情四溢的信，誓要推翻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寻求具体实施的建议。

陈独秀没有回信。1919-1921年期间，他大约收到了几百封这样的信。但巴金在本地找到了同志。他加入了一个叫作“均社”的无政府组织，并成为其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同东部沿海的许多著名杂志一样，均社的杂志也会抨击军阀和要求妇女解放。1923年巴金移居东部地区后，他仍然阅读和写作大量号召文化和社会变革、阐明无政府主义原则的文章。他在上海的文学圈子里成为活跃分子，并且开始与流亡欧洲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通信。

1927年，巴金来到法国。在那里，他尝试着自己研究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一边学习法语，一边发表有关中国政治的文章，同时还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起源及其发展》。也是在那个阶段，他开始写作小说。当他还在法国时，他的中篇小说《灭亡》——背景设定在上海劳工运动组织者间——已经在上海最著名的文学期刊上发表。1928年，在从法国动身返回中国时，巴金读到了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写的讲述第二帝国时期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故事的长篇系列小说。这激发了他将自自己的家庭作为长篇小说主题的想法，这便是后来的“激流三部曲”。回到上海后，他便开始这项工作。他的长兄李尧枚，也从成都写信来鼓励他抛却所有的恐惧来揭露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中丑陋的真实生活。1931年，小说《家》的第一部分就发表在上海《时报》的文学副刊上。1933年，修订后的小说又出版了单行本。

《家》大受欢迎。到1936年，这部小说已印刷四次，售出成千上万册。这一年，巴金再一次修订了文字，又出版了一个新版，销量同样很好，重印多次。另一个修订版（第十版）1937年出版，并且同样重印多次。这一次，巴金开始着手写作《家》的续篇，以满足他的广大读者的要求。《春》的第一部分于1935-1936年间开始连载。政府当局查封了小说发表的报纸后，巴金暂时将手稿搁置，直到1937年秋日本开始占领中国东部地区才完成写作。日军占领上海期间，巴金居留在法租界地区。在1938年和1939年去南方和中原地区的旅行之后，巴金返回上海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这部小说出版后不久，法国

政府在欧洲向纳粹投降，新的维希政府在亚洲开始与日本同流合污。这时巴金离开了上海，在蒋介石国民政府统治下的西南地区度过了战争的最后几年。在战时首都重庆，巴金的朋友曹禺，将《家》改成舞台剧，呈现给热情的观众。

战争末期，巴金返回上海。当胜利的共产党1949年进驻上海时，巴金留了下来，并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与新政府合作。他的任务之一是记录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与美军作战时的英雄事迹。1950年代期间，他还不断地对自己的小说做了修订，其中包括“激流三部曲”以及由长居北京的美国侨民沙博理（Sidney Shapiro）翻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家》的英文版。1930年代巴金对《家》的修订主要是勘误和删除重复的段落，而1950年代的修订则是政治性的——批评城市居民的冷漠的段落去掉了，提到无政府主义的部分删除了，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也比1933年版中更为果敢坚定。^[14]巴金的此次修订多少也受到了曹禺改编的《家》的剧本的影响。

1950年代，香港和内地都拍了电影《激流》。1956年内地拍摄的电影《家》尤为成功。著名演员孙道临饰演了充满矛盾的兄长高觉新，曾在40年代曹禺的话剧中饰演他的妻子瑞珏的张瑞芳在电影中饰演了同一个角色。

到60年代初期，“激流三部曲”的名气随着电影上映越来越大。巴金也因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即使在50年代他并没有出版新的小说，也几乎没有写什么新的故事。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巴金的攻击是毁灭性